

梁大鹏： 一生痴教 梦萦椰子园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海南百年文化背影



在海南现代教育史上，梁大鹏（1911—1998）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1947年，他主持筹建了海南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私立海南大学，与当时海南政商学界的精英人物一起创造了海南教育史上的奇迹。随着私立海南大学的筹建，一个个在海南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和我们实现迟到的相见，陈序经、颜任光、范会国、宋子文、张发奎、陈策、王俊、韩汉英、郑介民、林廷华、周成梅、黄有鸾、云竹亭等等，他们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在战火未息的孤岛创办现代大学，精诚合作，力争图强，其为海南前途、命运敢担当的勇气和决心，在渐行渐远的历史中，愈加显现精神的可嘉。

1950年2月，私立海南大学副校长梁大鹏为学校争取美国资助而专程飞赴台湾。两个多月后，隆隆的炮声响彻海南上空，海南全境很快在一片硝烟里宣告解放。留美政治学博士出身的梁大鹏，自此就再没回到他热爱的故乡海南和倾注了他心血和热诚的椰子园。

心怀大志，主修政治

在梁大鹏的记忆中，万泉河水是如此清冽纯净，两岸的植被繁茂，长年微风吹送，令人神清气爽，心境宽阔。1911年8月31日，即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在乐会（今琼海市）一个叫做排塘镇书田村的小村庄里，梁大鹏出生。梁家算是耕读之家，梁父将独子取名“大鹏”，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幼时的大鹏确实聪慧过人，且已经显现出胸怀大志。1926年夏，刚从岭南中学毕业的梁大鹏奉父命，与博鳌乡排园村的盐商卢修銮的五女卢卓群订婚，次年完婚。于是，万泉河畔便出现了海南现代史上的一桩值得玩味的婚配：年长梁大鹏四岁的卢卓群是琼东县（今属琼海市）嘉积镇东路中学（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的毕业生，她的大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美术家卢鸿基先生。1929年秋，正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的梁大鹏携新婚妻子返校时，顺便也把大妻弟卢鸿基带到上海求学。1930年夏，梁大鹏大学毕业，旋即在外家的资助下去美国留学，主修政治学，1933年获密执根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又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

现居北京的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者卢家荪曾对其从未谋面的姑公梁大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为揭示梁大鹏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靠的凭据。他向记者介绍说，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年间，科学救国、实业报国成为时代潮流，出洋留学的人大多学些理工、商经及医科之类既致用又易谋生的专业，即便是文科也以文、史、法、哲居多。至于政治学，不仅在国内鲜为人知，就是在二战前的欧美诸大学，亦属新兴之学科。因此，对梁大鹏的选择，梁、卢两家都觉得有些意外。据考，在当时的国内诸大学，除在法学院、系开有政治学专业或课程外，鲜见专门的政治学系。而梁大鹏所读的复旦大学是在1929年才增设法学院的，由此推测，梁大鹏选择政治学完全是个人的意愿。不过，就梁大鹏去国前的社会形势及其接受教育的状况而论，他在选择专业时应当是深思熟虑过的。

处于20世纪初叶的知识青年，内忧外患的国势对个人的生活与理想的选择非常直接。随着国内政治力量间的生死搏杀和社会现实的日益严酷，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人逐渐分离为几大类：一部分追求彻底的社会变革的激进者投身到了武装斗争的洪流中；一部分寄希望

于广泛的社会改革的温和者走到了实际生活的天地；一部分厌倦了政治纷争的观望者进入了青灯黄卷的书斋；一部分有志于社会进化的执着者则将目光投向了域外的文明。梁大鹏大概是属于最后一部分人。

卢家荪说，对于一个初出校门，涉世不深的青年来说，学校的教育无疑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梁大鹏出国前就读的学校——岭南中学和复旦大学早期都是教会学校。岭南中学是岭南大学的附属中学，1927年中国人收归前，它的管理、教学、研究等等都是由美国人或是美国教会认可的中国人（一般是留学生）负责的。据1992年出版的《中国高等学校变迁》一书介绍：“该校师资阵容颇强，学风严谨，基础理论扎实，学生外语水平高，学校富有凝聚力。在华南地区和海外享有盛誉。”外语水平高，是因为当时在华的教会学校普遍采用英语讲授，这种教学上的特点对少年的梁大鹏无疑影响至深。同岭南一样，复旦大学最早也是以教会人员出任师资，“在教学上既重视国学，又十分注意外语与西方学说。”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侧重更给青年的梁大鹏烙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两个学校的教学特点在梁大鹏后来的教育生涯里都有很突出的表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琼籍学者苏云峰先生对此印象颇深，说梁大鹏“不论在海大还是政大，上课时则用英语直接讲授。”因之，他曾被人批评是“殖民主义教育者”。姑不论这种批评是否妥当，但梁大鹏受殖民教育的灌输很深却是不争的事实，后来的私立海南大学采用英语授课也显然是梁大鹏的主张。

学成归国，教育兴邦

“在美国的七年里，梁大鹏先后翻译和编写了《日本政府》、《日本的发展》及其博士论文《菲律宾政党发展史》等著作。回国后，又陆续发表了《菲律宾民主政治的观察》、《宪政是否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评所谓民族政党》、《菲律宾独立运动之过去与未来》等，遗憾的是，多年来，我查寻了许多公私藏籍，都没有找到这些著作，故无从了解其中的立论和见识。但是，通过这些标题，我们还是不难体会梁大鹏的用心和志趣的。”卢家荪十分感慨地对记者说。

1937年，梁大鹏学成归国时，适逢“七·七事变”。为爱国热情驱使，他在海南老家只住了十天就动身北返——他回国时是在上海上岸的，当时正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的卢鸿基专门抵沪迎接。那时日本军队正打上海，梁大鹏想从广州转道香港去上海参加抗战。但他赶到广州时，因为战事吃紧，去往上海的水陆交通都已中断，从戎杀敌不成，他便留在广州，以文报国。9月初，梁大鹏创办了一份名曰《贯彻评论》的杂志，自任主编，鼓吹抗日。

1938年秋，武汉沦陷，广州亦告危急。迫于形势，梁大鹏奉命撤离广州——此时他经同乡韩汉英（时任中央军校四分校主任）的介绍参加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工作。离穗后，梁大鹏先到了广州湾（今湛江霞山），与刚从海南老家逃难到此的妻子和小妻弟卢鸿谋等亲属汇合，尔后一起取道广西桂林到达战时的陪都——四川重庆。

不久，卢鸿基也随郭沫若等一大批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文化人由武汉辗转撤到了重庆。时关国破家亡，兵荒马乱之际，一家人幸得在大后方聚首，其喜悦之情是非言语所能形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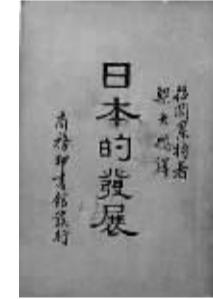
“据家人回忆，刚到重庆的那些天，大家经常见面，其中多数时候都在梁大鹏的住处。一来因为他的住房较宽敞；二来因为其有家室，吃用方便。但好景不长，由于梁大鹏与两位妻弟卢鸿谋、卢鸿基政见不合，时有龃龉，最后干脆绝了往来。”卢家荪追忆说。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部在当时是一个很特殊的政府机构，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曾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意味深长的一页。其任务主要负责和指导战时的政训和宣传工作。部长由国民党方面的人担任，初为陈诚，后为张治中。副部长二人，一位是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另一位是黄琪翔，代表国共之间的第三党（农工民主党）。政治部下辖四个厅，除郭沫若及其属下第三厅（宣传厅）的主要人员是共产党人外，其余以国民党人居多。由于政治部的工作性质的需要，在当时，先后有一大批国内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出于“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的共识而效力其中，如杜国庠、胡愈之、阳翰笙、张志让、冯乃超、钱远铎、胡风、沈雁冰、田汉等以及金山、白杨、秦怡等一些影剧明星，因为他们大部分集中在第三厅，故时誉第三厅为“名流内阁”。也正因为有这么多文化精英，使国统区的抗战文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抹上了浓厚的色彩。

梁大鹏当时在政治部直属的设计委员会任少将设计委员；学美术出身的卢鸿基则在第三厅第六处（艺术宣传处）第三科（美术科）任少校科员；小妻弟卢鸿谋则在郭沫若身边任少尉副官。因为这种关系，一些在重庆的海南青年也通过他们谋到了一份职业，一时成为流亡中的海南青年心中可依靠的对象。

卢家荪说，因为工作比较松散，和政治部的许多文化人一样，梁大鹏在担任设计委员的同时，还应聘兼任母校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这所流亡大学里，他前后讲了五年的政治学。“或许正是这段经历，使梁大鹏逐步坚定了‘教育兴邦’的志向。海南学者周润章先生说的‘抗日战争一结束，海南精英聚集于当时陪都重庆，议论振兴海南教育问题’的情况便是史证。”卢家荪说。

（下转 B5 版）



梁大鹏译著



1934年卢鸿基（右一）和五姐卢卓群（左一，梁大鹏夫人）、母亲及侄女合影。



梁大鹏
(前排右四)与
私立海南大学
乐会籍师生合
影(1948年)。